

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李治安

摘要:由于疆域广袤、民族风俗多样,东汉以后,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诸地域子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主旋律”。首次南北差异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北朝体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朝体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北朝三制度的“命”。元统一后的南北差异博弈整合,北制因素过分强大,总体上占上风。朱元璋、朱棣父子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的另一次整合,改而以南制为重心。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曾经被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5世纪以后的江南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推动着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总体上继续繁荣,最终避免了欧洲5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关键词:中古;江南;元明;南北整合;大运河;唐宋变革论;夷夏东西说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5.01.003

五千年的连绵发展,是中华文明独有的优长与特色。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又导致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触和整合。在若干子文明整合发展过程中,中原、关陇、海岱、江南等区域均在各个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贡献,东汉以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南北地域整合中江南及大运河的角色功用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探索,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贡献

鸟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共时性”地存在若干个地域子文明板块:以文明属性划分,可分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即使在农耕文明内部也存在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块分野。“历时性”地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大致发生如下八次较大规模的地域子文明的整合发展:

(1)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传说中华夏先民部落在黄河中游的初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元、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脉络”(项目编号:12AZS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拙文《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步整合。

- (2)大禹治水创建夏朝与汤灭桀建商朝——第一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 (3)武王克商与西周封邦建国——第二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 (4)嬴政翦灭六国与秦朝郡县制统一天下——第三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 (5)汉武帝征讨匈奴与汉地、漠北、西域的首次整合、融汇。
- (6)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第一次南北地域的博弈整合。
- (7)辽宋金元明清时期南北地域的进一步整合。
- (8)民国“五族共和”为代表的多子文明整合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

1933年,傅斯年先生曾撰《夷夏东西说》,首次阐发了夏商周三代“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二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重要观点^①。此文堪称廓清上古东、西地域子文明共存整合的里程碑式的论著,首次解决了前述一至四次东、西子文明相互关系的基本问题,拓荒开创,功莫大矣。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推崇备至。认为:“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具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②。尔后虽然出现了少量试图质疑该说的文章^③,但也仅是批评其有关夏文化地域的某些局部不足。如同任何经典宏论在阐发主流、本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舍弃偏枝末节的惯例,上述不足亦属正常。故而少量质疑,无关宏旨,也无法撼动“夷夏东西说”的基本立论及贡献。

二、东汉以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

对傅先生八十年前业已指出的“自东汉末”“常常分南北”,即东晋和南宋南渡后各二三百年来分裂对峙所导致的颇有差异的南北两大地域子文明或承载板块间的关系,笔者勉为“续貂”,试作初步探研。

先说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

1945年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揭示隋唐制度多半出于北朝,又受到南朝的部分影响,进而澄清了北朝制度的内涵、流变^④。20世纪90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指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⑤近年,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又围绕隋唐“北朝化”、“南朝化”何者为主流,展开了小小的争论^⑥。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81—182页。

② 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与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③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第7卷第6、7期;程德祺:《略说典型龙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温玉春:《夏氏族起于山东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④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页。

⑤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8页。

⑥ 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55页;阎步克、胡宝国、陈爽:《关于南朝化的讨论》,http://www.xiangyata.net,2003年6月2日;阎步克:《南北朝的不同道路与历史出口》,http://bbs.guoxue.com,2004年8月24日;将无同(胡宝国):《关于南朝化问题》,http://www.wangf.net,2006年4月14日;羯胡(陈爽):《“历史出口说”的“理论出口”》,http://www.mzyi.cn,2007年3月。

以上争论都有史料依据和合理性,又相互抵牾对立,似乎单用其中一说难以涵盖隋唐时期的复杂历史情况。笔者拙见:南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种体制或线索来发展演化的。两者各有其赖以生存和实用的空间地域——南方和北方,又在并存发展中互相交融,互相影响。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制的问世,黄河中下游东、西子文明的整合也基本完成。而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以长江或淮河为界限的南北两大地域的差异转而上升和凸显。经历近三百年的南北朝分裂对峙,特别是受“五胡乱华”等影响,南方与北方的制度状况或发展线索呈现异样,也是情理中事。“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于东晋、宋、齐、梁、陈所沿袭汉魏西晋的体制。“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在北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体制。诚如阎步克教授所言,“隋唐王朝都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故隋朝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尔后,隋唐二王朝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笔者的看法大致可以找到三条证据支撑:贯穿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均田、租庸调和府兵三大制度,均主要实施于北方,又都在中唐瓦解。替代它们的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 and 募兵制,正是整合后南朝因素转而占上风的结果。北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三制度的“命”,也与上述南北地域差异的整合趋势密不可分。

再谈元、明帝国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

继辽、金、西夏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了统一南北的元王朝。元统一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①等抵牾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制因素并存博弈的状况。蒙古草原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更是始终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长期发挥着支配作用。相对于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表现为:职业户计制与全民服役,贵族分封制与驱口制,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儒士的边缘倾向与君臣关系主奴化。元朝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汇互动、博弈整合,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过渡”或整合发展,同样是在此类融汇整合中逐步得以实现。不过,元统一后上述博弈整合,呈现为北制向江南的推广、南制因素遗留及部分上升且影响全国等较复杂的互动过程。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的过分强大,元统一后整合的结果,总体上是北制因素占上风,南制因素依然居从属。

朱元璋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号,重建了汉人为皇帝的明王朝,也采取过定都南京,惩元末权臣和贪赃之弊,废中书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创建卫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黄册”及“鱼鳞册”等新制度,力图较多摆脱蒙元旧制,使国家体制恢复到汉地传统王朝的形态上来。但不容忽视的是,朱明王朝又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这与朱元璋、朱棣父子带有个性色彩的南、北政策及朱棣迁都燕京都有密切关联,客观上更是元朝覆灭后所遗留的社会关系、文化意识等潜在影响使然。如果说朱元璋实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顾中原北地的倾向尚带有偶然或不稳定性,朱棣就与乃父显著不同了。朱棣“靖难”,以燕京和北直隶充当根基地,其军旅精锐包含蒙古朵颜三卫等,又残酷镇压建文帝势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对立面,遂导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等政策^②,导致其封爵燕王,肇兴且起兵燕邸,最终迁都燕京等以燕京北地为基业所在的新体制。又兼他七次亲征大漠蒙古时难免受到草原习俗及主从关系等影响。其结果,朱棣实行北方本位政策,形成政治驱动颇强,主、客观综合支撑等较为成熟、稳定的态势,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明朝的军户制,“配户当差”户役法^③,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诛杀功臣士大夫,等等,

① 胡祗适著,魏崇武、周思成点校:《胡祗适集》卷二十一《论治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40页。

②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七七《王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99页。

③ 参阅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朱元璋率先多半保留变通,后又被朱棣等略加改造而长期沿袭下来。换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别是朱棣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严重地影响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较前期明显改变,南、北制因素开始实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为重心。主要表现在:募兵制逐步占据主导,“一条鞭法”取代“配户当差”户役法,民营纳税淘汰匠役制,隆庆海禁开放,等等。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的“一条鞭法”,应该是南、北制因素的再整合的关键。某种意义上,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然而,在某些领域内北制因素或改变无多,或依然如故。主要是伴当仆从隶属、籍没制及贱民遗留、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等,这四者对明代朝野的影响长期而深刻^①。

三、5—16 世纪江南在南北地域整合发展中的能动角色

据唐长孺先生研究,南朝在孙吴豪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地主山林屯墾和田园形态,荫占佃客及其他依附民劳作。商业方面不仅建康城(今江苏南京)有四个市场及其与官廨、住宅的杂处,还出现了不少非官方市镇草市。率多从事商贾致富,泛舟贩运交易、海外商贸频繁及贵族官僚经商盛行,私人作坊出现和官府作坊的和雇、召募等萌生。估税、关津税、市税等名目的商税及包税,相继问世。^② 陈寅恪也说:南朝“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③。东晋和刘宋主要沿用世袭兵制,刘宋中叶募兵增多,齐梁募兵完全取代了世袭兵制^④。令人有些感叹的是,唐前期的地税和户税,实乃与南朝梁陈据田亩征租及据货征调,一脉相承。而杨炎“两税法”的计亩征税及田亩归属户产的原则本来就是“南朝成法”。唐代不仅江南商业活动仍然沿袭南朝,诸如沿江草市和北方店铺兴盛,坊市制破坏,海外贸易发展,货币交换比重增长,行税、住税和盐、茶、酒税等商税征收,都带有南朝的因素。唐代商品经济和财税规制无疑是沿袭南朝的轨迹而发展起来的。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后取代府兵制的募兵,又能够从南朝募兵找到类同物^⑤。足见,中唐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动,大多可以溯源于南朝。中唐以后之所以南朝因素占上风或以南制为“出口”,之所以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制成为中唐那次整合后的基本成果,就是因为均田、租庸调和府兵等北制大抵未在江南推行,南朝和隋唐江南较为先进的经济社会秩序一直未曾被改动。

诸多研究表明,忽必烈平宋战争以招降为主,较少杀戮。江南的先进农业、原有的土地、租佃、赋税、繁荣的手工业、商贸及海运、理学、科举等制,南宋所继承的唐宋变革的主要成果遂得以基本保留或延续发展。尤其是浙西一带圩田及沙涂田等能在人口稠密和土地偏少条件下追逐高于一般田地十倍的收获^⑥。元末杭州丝织业等还出现了少量的自由雇佣劳动^⑦。大土地占用和租佃关系在江南依然在发展。譬如延祐(1314—1320)间松江下砂场“多田翁”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⑧。二税制及差役亦在保留沿用。海外贸易的海港、贸易伙伴、中外海船的来往、基本贸易制度等,都承袭南宋。后又增添两个特别的因素:宫廷“中买”珠宝和斡脱商。漕粮海运亦由江

① 以上参阅拙文《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00—106、125—141页。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60页。

④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79页。

⑤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280、299、301—319、411页。

⑥ 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一·田制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6页;《洪武苏州府志》卷十《田亩》,《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432册,第424页。

⑦ 郑天挺:《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4—270页。

⑧ 杨瑀著,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3页。

南宋清、张瑄倡导主持,海外征伐的军士、船只及技术同样主要来自江南。故海外贸易、海运和海外征伐三者都算是南方航海技术、人力、财力等为元统治者所用的“典范”。尤其是元代海运和海外贸易的高度繁荣及其向东海、南海的开拓发展过程中,南制因素厥功甚伟。儒学与科举,是保留南制因素最多,并在南、北制因素博弈中最能体现南制优长的方面。理学北上及官方化,朱熹之学正统地位的确立,超族群士人文化圈的形成^①,表明江南在儒学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而元仁宗恢复科举,应是南制文化因素滋长并冲破蒙古旧俗束缚,得以跻身全国文官选举通行制度之列的突出成绩。尽管元代整体上南制因素依旧居从属,但经历上述兼容与初次整合,南北方之间的交流、沟通愈来愈频繁,相互依赖、彼此密不可分,更是大势所趋。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的可贵贡献,不仅在于首次完成了以少数民族为主角的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大统一,还在于在南北整合中坚持北制本位的同时又实行南北异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最富庶、最发达的经济实体,不自觉地继承了南方唐宋变革的成果,从而为14世纪以后南北进一步整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朱元璋父子在江南的“划削”富民和“配户当差”,导致明前期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蜕变,南方唐宋变革的成果一度被毁坏大半,但明中叶以后江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发展,江南以富民为主导的农商秩序也逐步恢复重建。隆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发展,外贸入超颇丰所带来的大量白银流入,刺激了东南商品经济的再度繁荣^②。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前,江西、南直隶、浙江等地已于嘉靖和隆庆年间率先实施^③,根源又在于“一条鞭法”主要符合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关系的需要。晚明商品经济和城市商业化的发展较快,东南沿海城镇市民社会或有雏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显,思想禁锢大大减少,等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南宋及元东南城镇社会的迅速重建与发展。李伯重所云“江南早期工业化”,也主要针对明嘉靖中叶的1550年至1850年的苏、松、常、镇江、江宁、湖、嘉兴、杭及太仓等八府一州之地。尽管此种工业化具有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的“超轻结构”特点,但毕竟属于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能带来较高效率的“斯密性成长”,又兼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所构成的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使中国国内贸易充任着江南早期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最终造就了江南一度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④。

生产力无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们注意到,10世纪以后手工业、农业等生产力方面的显著进步,大多是率先出现于江南。诸如宋元两浙涌现出专门从事丝织业的家庭机户,随之又有染色业独立和印花布风行。元代黄道婆轧棉搅机、绳弦大弓等棉织工具改进及“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法,也发生在松江府乌泥泾^⑤。陶瓷烧制方面,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的析晶釉,建窑兼有的分相釉和析晶釉,龙窑的普遍采用;景德镇则有以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采用进口青钴料烧制的元青花瓷,以及烧制难度更大的釉里红等^⑥。火器方面,“蒺藜火球”、铁火炮和“水底火炮”是南宋最先使用的陆地及水下爆炸性火器,寿春府等处制造的突火枪又是最早的管型火器和近代火枪的前身。造船技术在已有福船、沙船和广船等船型的基础上,率先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密舱结构”和“平行式梯

① 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20、62-68页。

② 参见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4-277页。

③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0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五《户部一·一条鞭》亦载,浙江巡抚庞尚鹏嘉隆之际在浙江奏行“一条鞭”,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498页。

④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523、536、542页。

⑤ 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社会经济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4页;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黄道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页。

⑥ 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教育科学文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318-319页。

形斜帆”^①。护田挡水和水渠灌溉的圩田及相关水道疏浚,也集中于宋元濒临长江的湖泊沿岸等低洼地带^②。以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推进与提升,与这一时期以长江三角洲为首的早期工业化之间,似乎是互为因应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繁荣及领先全国的原动力。

葛金芳还主张,宋以降长江三角洲等狭义的江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农商社会”。此江南“农商社会”具有五个特征: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早期工业化进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③。上述观点可以得到斯波义信、李伯重、樊树志等诸多经济史学者一系列论著的有力支持,也与20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有关讨论相呼应。即使有人不愿意使用“农商社会”的说法,可谁也难以否认:宋元明清长江三角洲一带较多存在“农商并重”和“商业上升为社会生活繁荣的主要基础之一”的“世相”,进而悄然形成“农业和商业共同支撑社会经济的格局”^④。诚然,广义江南地区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呈现不平衡状态。以长江三角洲等为中心的地区自5世纪以后的经济富庶和文化繁荣一直居全国之首,同时又是整个江南最发达的地区。湖北和湖南北部稍次之,16世纪长江三角洲一带“早期工业化”推进之际,农业重心逐步转移至湖广,随而出现“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而江西和岭南尚处于晚近逐步开发的区域。

如果我们把唐宋前后的三四次南北博弈整合及唐宋变革的内容作一对照,不难发现北朝到唐前期的体制(科举例外)、元诸色户计全民当差和明前期的“配户当差”户役法等,大抵属于唐宋变革以前的旧形态。南朝统治下的江南经济及财税体制大抵是对唐宋变革的某种良好酝酿或准备。中唐两宋的江南无疑属于唐宋变革高潮中经济文化最先进和最具活力的区域。元代及明中后期的江南也属于承袭南宋“唐宋变革”成果最多的区域。就是说,5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⑤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依然是统一国家的条件下南北博弈整合中新兴的动力渊藪。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的角色及能动功用,至为关键。

四、大运河对南北社会经济整合发展的作用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大体是依据帝国核心区、财赋及军事控驭等因素,自西向东逐步迁移的。周秦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国都主要在镐京、咸阳、长安和洛阳,北宋东移至汴梁。金元明清,北方民族南下又造成北移燕京。经济文化重心则是经历了前述东晋和南宋两次大规模的自北向南的转移,而且南移过程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在这两次南移之前,北方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是非常先进的。但

①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集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第662页;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器甲之制》,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923页;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教育科学文化卷》,第172—174、176—178页。

② 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社会经济卷》(上),第220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212—214页。

③ 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论略》,《纪念郑天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84—400页。

④ 前揭葛金芳文,第384页;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纪念郑天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第477页。

⑤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之《结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8—340页;另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宋元明清的社会整体性》,《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会议文件》(打印本),2013年,第175—185页。

在这两次南移之后,特别是唐后期五代和契丹、女真、蒙古南下或入主中原,战乱频仍,北方中原地区屡遭严重破坏,户口凋零,经济发展缓慢。因此,唐后期以降,国家的财赋不得不主要仰赖东南。

与6世纪以后经济上北方依赖南方形成对应反差的是,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隋唐北宋国都尚在黄河中下游,元明清三朝进而北移燕京。政治中心大抵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且延续了近千年。

大运河的修筑,是中古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南方、北方经济政治中心错位的产物。大运河作为漕运命脉,不仅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统一具有战略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内容的南北差异博弈和整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长期充任南粮北运的漕运黄金水道,有力支撑了千年以来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自中唐设转运使总揽漕运,明清常设漕运总督于淮安,官至一、二品,位高权重,专门掌管跨省区的大运河漕运及河道事宜。大运河漕运及管理在6世纪以降诸王朝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运河对维护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统一,也厥功甚伟。除了供给京师官民粮食之外,隋唐征高丽和经营东北,唐后期朝廷对付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藩镇割据,元朝防御北方蒙古诸王反叛,明成祖朱棣“靖难”和迁都燕京后旨在防御蒙古的长城“九边”军事镇戍,清乾隆帝等经营蒙古、新疆、西藏的所谓“十大武功”,等等,无不仰赖大运河漕运。

第二,大运河首次将司马迁时代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①自北向南连成一片,弥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河流稀少和陆路交通常因山川阻隔而艰难等缺陷,有利于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水系的东部地区的整合发展。

第三,大运河是沟通黄河中下游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为中古时期南北经济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大运河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国都间的连通渠道,也是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主要连通渠道。既有利于5世纪前后北方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又有利于发挥7世纪以后江南经济文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利于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伴随着漕运,还催生了以扬州、淮安、济宁、聊城、临清、天津等一批运河城镇经济带的繁荣^②。明人李东阳“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过鳌头矶》)的诗句,闻名遐迩。这种运河城镇当是唐长安和宋汴梁之外的另一类漕运商业城镇。自唐后期刘晏等盐铁使兼转运使以盐利补贴漕运,又因江淮、山东、长芦等盐场等都在运河沿线,大运河往往与官府榷盐及盐商经营联系在一起,成为历代盐商行盐贩运的南北通道。元明“开中法”以盐引招商运粮北边及丝绸、瓷器、茶叶等官民采购贩运等也需要依赖大运河通道。

第四,大运河还对南方、北方东部的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带来了深刻影响。盐商、徽商、晋商等商帮常年在运河一带贩运行商,山陕、广东、全晋等会馆林立。还形成了盐帮、漕帮等帮会组织。运河沿岸城镇还是元明以来回回人荟萃聚居之处,临清清真寺、扬州回回堂、杭州凤凰寺等就是历史见证。隋唐行科举制和元汉军镇戍、明卫所屯戍、清八旗绿营屯戍等推行之后,南方人游宦驻戍北方和北方人游宦驻戍南方的情况,频繁而普遍。千余年间,大运河又曾经是官员士人兵将等南北往返的主要通道,无形中对南、北方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带来了良好的影响。

五、余 论

东汉以后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很大程度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及农耕文明内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块分野在五千年发展演进的产物。由于我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3270页。

^②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国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20世纪初蒙文通先生就曾提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的古史三系之说^①。就是说,东周时代,地处江汉、江淮的楚、吴、越等文明发展水平,已仅次于河洛、海岱等中原文明核心地带,在华夏诸地域子文明中位列第三。其水利、气候、植被、文明传统等方面的基础,再开发和后来居上的潜力,又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又兼前述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造成中原文明南下且与江汉等文明的交融汇合以及若干次江南开发的浪潮,最终使江南后来居上成为现实。

10世纪前后的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地处东亚大陆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中国,获得了与域外其他主要文明交流沟通的新的航海通道,同时也给江南特别是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域外刺激。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秦汉“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到唐宋以降的“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经济趋势的重大转折^②。在此形势下,江南在全国南北差异整合中的角色功用显赫,就是顺理成章了。而大运河也生逢其时,沟通南北水系交通,适应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错位需要,充当了南方在经济文化上支撑、带动、辐射北方,推动全国整合发展的特有管道。

我们还可以从更长的时段和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思考:由于长城南北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大板块的长期并存、冲突和融汇,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经济和文化曾经被基本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随着千年来江南的开发而不断扩展和提升,进而在唐宋前后数次南北博弈整合中积极影响全国,推动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继续繁荣,不断进步。这就最终避免了欧洲5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步入黑暗中世纪的悲剧性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作用,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① 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② 葛金芳教授认为,秦汉和隋唐帝国以黄河中下游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为基础,特别是为防御匈奴、突厥等,故而主要是向西北开拓延伸其势力范围。此时期的基本格局可称为“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而中唐以后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已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此时期的基本格局又可称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南宋立国态势及经济格局论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19-220页)。就经济发展趋势而言,笔者基本同意葛教授的观点。

Abstracts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a Discus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Yan Buke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first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ngs are revealed through comparison. The deep principles transcending specific characters become important when two or more samples are involved. Theoretically, the basis for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is a common frame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framework often extends beyond the field of history into the field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even of scienc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there could emerge kinds of distortion and deformation if one sample is used as a mold to shape another. Modern academics once revolutionize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yet its content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developed first in the West. It provides many methods being considered as “universal”, bu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many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regions are not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The vast multitud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ifacts remain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incomparable continuity of Chinese history makes some inherent law of human society display more prominently. Chinese history could provide more academic inspiration, creation, and new knowledge for the “common platform”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learning of world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Chinese scholars. The task of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requires the continued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 Traditional Country:

a New Discussion of the Reformation of Zhang Juzheng

Wan Ming

The reforms of Zhang Juzheng in the Ming Dynasty we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reforms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ch connected the world into a whole, and we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world market, as well as the silver becoming the world currency, i. e.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forms were a process, not a discrete event. They stemmed from the germination of a market economy, with the reformation on taxes and corvee over one century and a half as preparation; they did not adhere to the national decree of single tax in silver (*yitiaobian fa*), and left two important legacies of *Fiscal Notes in the Reign of Wanli* and *Regulations on Land Measurement*. The core of the reforms was finance, aiming at constructing a new financial system, which meant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to an economy dominated by silver. That marked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s well as the unprecedente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rom a traditional country to a modern country. It is not the case as people used to deem that Zhang Juzheng’s measures ceased after his death; his reforms were even more successful than those of Wang Anshi.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nd the Role of the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Middle Antiquity

Li Zhi’an

Because of the vast territory and diverse national customs,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f China became the “theme”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gional civiliz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first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happen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ere the foundation and entry point for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ere their outcome or exit.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started with the trend of

“southernization” which reformed the three main institu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 e. the systems of land equalization, the grain-labor-cloth tax, and the militia garrison. After the unit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Northern institutions generally prevail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Due to the chances such a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Zhu Yuanzhang and Zhu Di, the Northern institutions dominated once again in the integration during early Ming Dynasty. The Southern institutions became the focus in another integration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institutions which started in the mid-Ming. The single tax in silver focusing on abolishing corvee c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a milestone, with the Southern institutions prevailing over the Northern ones. The advanced Huaxia economy and culture survive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Jiangnan*) by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Song, though it was interrupted two or three times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ince the 5th century, the *Jiangnan* area had been China’s economic center, cultural artery, and a “heartland” where the people were rich, with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developing simultaneously. During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Jiangnan* area still represented the trend of social econom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acted as the root of emerging power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under national unification. In the three or four times of such integration around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Jiangnan* area promoted continued prosperity in a united country, and finally avoided the European tragedy of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being interrupted or ruined temporarily by the German race.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continued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was uninterrupted in general, which is unique worldwide, and the *Jiangnan* area played an undeniable role in it.

The Limitation, Challenge, and Ideal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as an Academic Area of Growth

Jia Zhenyong

The trend of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as resurfaced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rich experiences gained in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a, but at the same time, academia is faced with some insurmountable bottlenecks. The academic obstacles and discussions on many hot issues, such as the phenomenon of “linguistic trap” in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y, not only reflect the chaos and disorder in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but also contain the possibility or feasibility of innovatio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is an open and inclusive platform with high academic value, where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system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ould be highlighted.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and compilations of literary history, there exist the problems of deviating from the literary study itself, internal division within the discipline that are too refined, reduction in artistic and aesthetic mission, and a weak sense of academic ethics. Only if we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literature”, and coordinate kinds of research functions around discovering, choosing, and judging excellent works, the academic mission of “confirming the mind, and inheriting the immortal” could be realized.

Chen Sanli’s Early Poetry Works and the Poetic Circle of Hu’nan and Hube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Kaijun

Chen Sanli’s poems written before 1901 can be regarded as his early poetry works. When he stayed in Changsha from 1877 to 1889, Chen’s poems were closer to the “rhyme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first two or three years; during the next decade from 1880, the starting year of *A Poetry Record*, Chen Sanli followed Wang Kaiyun, and began to imitate the style of the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especially learning from the Jin-Song poets. From 1890 to 1895, while he lived in Wuchang, i. e. the last five years of *A Poetry Record* collecting, Chen studied and emulated the masters Du Fu, Han Yu, Su Shi, Huang Tingjian etc.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Zhang Zhidong, Liang Dingfen and other teachers and friends, thus his po-